





















闫振铎和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大多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60年代初进入艺术院校时，他们仍然可以接触到艺术界的前辈，比如教过闫振铎的董希文、吴作人等，了解他们是如何创作的，理解他们的思想。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以这些前辈画家为代表的艺术知识和体系经历了被边缘化和被压抑的过程，被主流艺术潮流，也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别是革命浪漫主义，所排挤。尽管在此期间，这些艺术家还是在持续实践，有一些也还在艺术院校教书。然而，他们的经验、实践和思想逐渐成为了暗流。进入20世纪7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陆续过世，而随着他们生命的终结，他们独有的贯连1949年前后两个时期的经验也消失了。

文革开始后，1949年以来建立起来的文化艺术体制被批判和瓦解。这种权力集中的制度结构就是由国家支持艺术媒体、美术家协会、美术馆以及艺术院校。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官方机构的组成部分，如艺术院校、艺术协会、博物馆和媒体等，才得到恢复。在北京，从1969年初到1970年的上半年，政府艺术机构和艺术院校的工作人员被迫停止了艺术创作。他们被派到五七干校或军事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艺术院校的学生被派到农村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1966年，北京的中国美术馆相关规划完全停止，直到1972年才得以恢复。

#### 四、1971年之后的艺术空间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在一个短暂的时间段内，频繁的艺术活动与实践重新出现在全国各地，大多数活动主要是由艺术家自发组织的，此时尚未完全恢复原样的官方艺术体制仍未成为艺术活动的主要主导者。但要理解70年代最后几年艺术领域所出现的空前活跃的现象，我们应该把视野投向文革之中，特别是1972年前后，政治文化上所出现的转折与松动。除了中国美术馆重新开放展览的事实之外，还有许多迹象表明，1972年开启了一个我们可称之为“长期复苏”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中仍将出现诸多反覆与波折。开启艺术领域这些变化的首先是出现在政治领域的重要转机。

1967年中，一部分扰乱社会生活的红卫兵遭到打击，学校“复课闹革命”，工厂、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直至1968年下半年，宣队、军宣队开进学校、机关、团体，红卫兵运动才偃旗息鼓。1969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于1966年5月的“中央文革小组”停止工作。随后，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全会的议程，重点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和加强战略问题。此后，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逐渐平息，全国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经济上基本刹住前两年生产下降的趋势，并且开始出现回升的迹象。1971年以后，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一些在文革初期关闭的图书馆局部开放。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坠机身亡，这成为文革期间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人们也已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无休止地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象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动乱势头有所减弱。从这一年开始，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开始下降；同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使社会秩序、生产状况等方面都出现了改观。周恩来重视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亲自部署和指导文化、卫生和体育等领域，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文艺事业随着迎来了转机，全国性美展也被提上日程。相应地，艺术家们能够相对公开地追求自己私人的艺术志趣，尽管这种追求依旧是谨慎的和保持在小范围内的，但相比之前已经放松了许多。